

# 从计划到市场:20世纪80年代中国价格改革思路的形成\*

——以1984年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为中心

缪德刚

**内容提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国对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单一价格制度进行了初步调整。至20世纪80年代初,扭曲的价格制度仍然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的发展凸显了城市改革的落后,而价格改革是城市改革的关键点。在此社会经济背景下,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讨论了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思路。其中,以“调改结合”为路径的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引起了中国政府高层领导的重视。虽然价格双轨制施行后伴生了一些负面的社会问题,但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键词:**莫干山会议 价格改革 双轨制

1984年,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莫干山召开了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这就是如今为人所熟知的“莫干山会议”。“莫干山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讨论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中心议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莫干山会议”的成果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提供了重要思路,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sup>①</sup>目前涉及“莫干山会议”的成果包括会议回顾性著作、<sup>②</sup>涉及价格改革或双轨制发明权的商榷类文章<sup>③</sup>以及理论评述性著作。<sup>④</sup>在“莫干山会议”议题中,最为瞩目的成果是关于价格改革的讨论。本文以“莫干山会议”对价格改革的讨论为中心回溯这场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推波助澜的会议。

[作者简介] 缪德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836,邮箱:ndg2016@126.com。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计划中国经济思想史特殊学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早期形成”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时至今日,“莫干山会议”仍持续产生着影响力。2011年11月6日,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委员会宣布,以华生、何家成、蒋跃等人组成的研究组和田源、张维迎为主要贡献人的“价格双轨制理论”获得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2年9月15日,以继承1984年“莫干山会议”精神的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新“莫干山会议”)在浙江莫干山举行。截至2017年9月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连续举办了6届。2017年9月17日,在第六届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上,莫干山研究院宣布成立。

② 如刘国新通过对“莫干山会议”的考察,说明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在回顾“莫干山会议”中价格双轨制产生的基础上,华生认为价格双轨制的过渡还没有结束。常修泽认为,“莫干山会议”不仅为此后国家改革开放思路提供了重要的咨议,其会议精神对后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分别参见刘国新《从莫干山会议对价格改革决策的影响看改革开放中的智力支持》,《北京党史》2015年第2期;华生《双轨制的始末》,《中国改革》2005年第1期;常修泽《史料版1984年莫干山会议》,《学术研究》2012年第11期。

③ 华生、张学军、罗小朋:《中国改革十年:回顾、反思和前景》,《经济研究》1988年第9期、第11期、第12期;石小敏、刘吉瑞:《经济学家首先要尊重历史和事实——评华生等〈中国改革十年(回顾篇)〉》,《经济研究》1989年第2期;郭树清、刘吉瑞、邱树芳:《全面改革亟需总体规划——事关我国改革成败的一个重大问题》,《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5年第1期。

④ 张军:《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一位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40页。

## 一、会议背景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逐渐步入发展正轨,然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单一价格对国民经济发挥的调节作用极其有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政府对工农业产品价格进行了初步调整,但受实践经验与理论政策约束,价格调整成效并不明显。20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在此背景下,城市改革呼之欲出。此时理论界对价格问题的讨论逐渐突破了原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理论分析特点,为后来价格改革思路的形成铺就了初步的理论积淀。

### (一) 价格改革是20世纪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中央政府就确立了对财政经济实行统一管理的方针。自1953年开始,按照《关于统一全国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的决定》,中央贸易部统一领导各类商业组织,并管理重要商品价格。中国政府对粮、棉、油实施计划收购和计划经营,后来对其他农副产品实行了派购和统一收购。集中统一管理、计划分配调拨为主的物资流通体制,对促进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和社会主义改造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计划分配供应范围的扩大,物资流通失去了市场调控的灵活性,逐渐显露出了一些弊端。在统购统销政策下,中国政府对物资管理体系进行过一些调整,但始终没有突破“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藩篱。<sup>①</sup>

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通过国营商业对重要物资进行收购与调运,并根据市场形势抛售,以稳定市场物价。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由于中国政府对物资的管制,很多商品只有单一价格,价格不能起到调节国民经济的作用,尤其是在1966—1976年间,国营商业独家经营商品流通,商品价格更加单一。政府对紧缺物资的管制,虽然巩固了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保证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推行,但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对国民经济的制约愈发凸显,如政府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收购农产品,扭曲了农产品的价格信号,给农业生产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政府对物价制度进行了初步调整。为了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差价,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提出,将粮食统购价格自1979年夏粮上市时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此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根据各自情况逐步作相应的提高。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用塑料等农用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较1979年和1980年降低10%—15%。为了防止物价调整造成波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要求,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以后,一定要保证城市职工的生活水平不致下降。不改变粮食销售价格,稳定群众生活必需的其他农产品的销售价格,某些必须提价的农产品,给予消费者以适当补贴。1982年9月,国务院转发了国家物价局、轻工业局、商业部《关于逐步放开小商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的报告》,决定对供求变化较快的三类工业品中的小商品价格在两三年时间分批次放开,实行市场调节,企业定价。《关于逐步放开小商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的报告》还指出,对价格要逐步调整,不能集中大批地提高价格。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指出,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少数重要农产品,继续实行统购派购;对农民完成统派购任务后的产品<sup>②</sup>和非统购派购产品,应当允许国营商业、供销社及其他合作商业组织、农民私人多渠道经营。收购任务以外的农副产品,购销价格可以有升有降。1984年9月9日,有国家重要领导人在提交至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报告中指出,价格改革是重中之重。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障碍是严重扭曲的计划价格。<sup>③</sup>

① 苏少之:《中国经济通史》第10卷(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73页。

② 包括粮食,不包括棉花。

③ 华生:《双轨制的始末》,《中国改革》2005年第1期。

## (二) 城市改革的先声:来自农村经济改革的推动力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提出要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搞好综合平衡的要求。同时,会议认为,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还十分薄弱,只有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全会提出了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及一些重要的农业方面的文件发布施行,推动了农村改革的进程。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感召下,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等省份开始了“包产到户”的讨论与尝试。后来,中国政府对“包产到户”的做法进行了初步肯定。1980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指出,“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该文件发布后,“包产到户”开始了普遍的推行。1980年初,全国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总数比例为1.1%。到1980年底,这个比例上升到约20%。“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地区农业产出显著增长。<sup>①</sup> 1981年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包产到户”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发展为完善的集体经济。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2年9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改革带来的农村经济变化,并指出农业经济面貌的改善对带动整个经济形势以至政治形势的好转起了重大作用。农业状况改善之后,中国政府又开始了解决重工业比例失调问题。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农村发生的影响最深远的变化是普遍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其主要形式是联产承包制。为了迎接城乡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大发展的时期,除了发展多种商业形式之外,要打破城乡分割和地区封锁。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肯定了1983年农村工作的成绩,提出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流通方面,继续调整农副产品购销政策,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市场供应的改善,继续减少统派购的品种和数量。三类农产品和统派购任务外的产品的价格放开,允许国营商业、供销社按合理的进销差率灵活掌握购销价格,以参与市场竞争和调节。<sup>②</sup> 后来的研究表明,按不变价格计算,1978—1984年农业增长率和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2.23%、6.05%。<sup>③</sup> 这段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业增长最快的时期。家庭联产承包制对农业增长率的拉动最为明显,农产品价格改革也有重要贡献。<sup>④</sup>

与农村改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市改革只是进行了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尝试,包括扩大生产企业的产品销售权和对部分计划分配物资实行敞开订货。随着“放权让利”改革的深化,由于基础工业品价格太低,加工工业品价格太高,基础工业越来越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价格问题越来越突出。当时国有企业对生产资料实行普遍的管制,改动一个产品的价格会触及很多部门的利益,城市改革难有突破。

①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页。

② 至1961年形成的农产品购销制度和价格制度中,将各种农产品划分为一、二、三类,分别实行不同的购销政策和价格管理方式,一类农产品有粮食、棉花、油料、木材等,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购销数量和购销价格均由政府确定。二类农产品有烤烟、黄红麻、蚕茧、茶叶、生猪、鸡蛋、毛竹、羊皮、牛皮及某些水产品和少数名贵中药材等,实行派购政策,派购数量由政府确定,执行计划收购价格和计划销售价格,完成派购任务后的剩余部分允许在市场上议价销售。直到1981年,《农产品价格管理目录》规定,国家统购、派购的一、二类农副产品为113种。三类物资是除一、二类外的其他农产品,实行议购议销政策。表面上看,派购之外的农产品和全部三类农产品由市场机制调节,实际上,由于当时处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市场机制对农产品供求和交易的作用十分有限。

③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第144—145页。

④ 田源、陈德尊:《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思路》,《经济日报》1984年9月29日,第3版。

### (三)理论准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讨论和价格理论的发展

1956年10月28日,薛暮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揭开了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讨论。<sup>①</sup>20世纪60年代中期前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围绕价值规律在社会经济中作用,以及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展开。<sup>②</sup>

1979年4月,在无锡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商品价值规律讨论会中,一些代表认为,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以及全民所有制内部企业之间交换的产品都是商品,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不可忽视。这次讨论会突破了苏联理论框架,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随后,理论界广泛讨论了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sup>③</sup>1979年,卓炯发表论文强调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并指出发展商品经济的中心环节是发挥银行的作用。<sup>④</sup>1982年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全面开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强调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将市场机制引入社会经济活动中,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逐渐被确立为改革的理论依据。1983年下半年开始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商品经济成为了“精神污染”之一,相关讨论一度停滞。1984年7月,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提纲时,起草班子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对是否要提商品经济争议很大。直到后来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与价值规律讨论伴随演进的重要问题是价格问题,两者之间联系紧密。从文献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界对价格问题的最早关注是源于经济计划工作的需要,如在制定生产资料的调拨价格过程中,有观点认为,制定价格政策不能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sup>⑤</sup>20世纪60年代前期关于价格问题的讨论多是围绕价值与价格之间的辩证关系。<sup>⑥</sup>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学界的关注点转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价格与生产价格之间的关系,其中相当部分的讨论是对此前主张社会主义社会价格为生产价格的批判。<sup>⑦</sup>1966—1978年对价格问题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79年对价格讨论的论著再次出现,但是讨论内容仍然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下。<sup>⑧</sup>1980年少数学者提出了进行价格改革的提法。1981年对价格问题的讨论已呈现出突破马克思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的态势,出现了苏联政治经济学范式下的影子价格<sup>⑨</sup>、价格的计算<sup>⑩</sup>、西方经济学范式下的价格理论问题<sup>⑪</sup>、新的

① 张卓元等:《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8页。

② 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于光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经济研究》1959年第7期;于风村:《论商品经济》,《经济研究》1962年第10期等。

③ 赵晓雷:《中国现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3页。

④ 卓炯:《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学术研究》1979年第4期。

⑤ 范若一:《略论价格政策与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8年第5期。

⑥ 赤兵:《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和价格》,《学术月刊》1963年第3期;杨坚白:《国民经济平衡和生产价格问题》,《经济研究》1963年第12期;作沅:《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形成的几个问题》,《江汉学报》1962年第8期。

⑦ 杨宏道:《社会主义社会的价格决不能以生产价格为基础》,《学术月刊》1965年第1期;陆尘辉:《生产价格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有百害而无一利》,《学术月刊》1965年第1期;泉章:《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批判“生产价格论”》,《经济研究》1965年第2期。

⑧ 孙连城:《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格基础》,《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李德华:《按生产价格定价和生产社会化》,《经济研究》1979年第4期;纪正治:《社会主义计划价格形成的几个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4期。

⑨ 毛立本:《影子价格简介》,《经济管理》1981年第12期;胡幼青:《影子价格问题介绍》,《价格理论与实践》1981年第5期;汪洋春:《影子价格的应用》,《价格理论与实践》1981年第5期。

⑩ 汪显曾:《价格预测与数学模型》,《价格理论与实践》1981年第2期;贾凤和:《价格设计与预测的线性规划模型》,《价格理论与实践》1981年第5期。

⑪ 李达昌:《也谈垄断价格——与魏埏同志商榷》,《财经科学》1981年第2期。

价格形式<sup>①</sup>以及价格调整策略的讨论<sup>②</sup>等话题。1982年除了对价格改革等话题关注之外,<sup>③</sup>出现了  
对价格补贴办法<sup>④</sup>、西方国家定价方式<sup>⑤</sup>问题的阐述。1983年以西方经济学范式分析价格问题的研究  
有了更大突破,<sup>⑥</sup>同时介绍国外价格改革的论文显著增多。<sup>⑦</sup>1984年学界对价格改革的呼声更加  
高涨,改革思路也更加细化、明确。如楼继伟、周小川等人提出运用经济模型算出价格改革方案,使  
当时的价格逐步靠近供求价格。<sup>⑧</sup>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学界对“商品经济”、价值与价格问题的讨论,为后来价格改革  
受到学界关注,并最终形成践行思路做了前期理论储备。

## 二、莫干论战

### (一)会议筹备

在中国农村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的社会背景下,城市改革却举步维艰。1984年1月24日至29  
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并在2月24日发表了办好经济特区和增加对外开放城市的讲  
话。如何解决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使1984年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关口。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知识青年回城,一批关注中国经济改革的在京青年学者分别  
聚集成不同群体,如“四君子”“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青年就业组”“国民经济双周讨论会”等,  
他们与上海、天津、武汉等地的青年学者有着广泛的联系。1984年初,朱嘉明、黄江南等人关于莫干  
山会议的设想得到了浙江、陕西、天津、北京等地有识青年的响应,并有《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  
《世界经济导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效益报》、《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中国青年》、《中国青  
年报》、浙江经济研究中心、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等10家机构愿意担任会议发起单位,同时浙江省委省  
政府对会议全力支持。1984年6月12日在《经济日报》上发布征文通知后,会务组共收到论文1300  
余篇。经过7次评审,会务组从论文中选出124篇。<sup>⑨</sup>

1984年9月3日莫干山会议召开,含论文作者、党政机关人员、媒体代表、企业代表在内,实际参  
会者近180人,分别来自24个省、市、自治区。按照论文和代表个人兴趣,会议分为宏观组、企业组、  
开放组、流通组、金融组、农村组、理论组7个课题组,分别围绕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宏观问题、工业管  
理体制和企业活力、对外经济开放、中心城市多功能、金融市场与股份经济、农村产业结构变动及农  
村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涉及的基本理论等问题展开讨论。与会代表不在会上宣读论文,而  
是围绕各分组主题发表观点。这些观点既具备一定的理论水平,又从实际出发贴合当时的中国国  
情,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中青年经济学者的改革智慧。

① 张旭初:《浮动价格初探》,《价格理论与实践》1981年第1期。

② 何光裕:《浅谈价格设计的理论问题——调整价格的设想》,《价格理论与实践》1981年第3期。

③ 何建章、张卓元:《关于价格体制改革的一些设想》,《价格理论与实践》1982年第3期;张文英:《有步骤地改革价格,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学习党的十二大报告会》,《上海经济研究》1982年第12期;黄长玘:《价格全面改革的道路探索》,《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

④ 叶学明、叶锦棠、肖汉英:《关于改进补贴办法的一些设想》,《财政研究》1982年第4期;弓任夫:《价格补贴的客观依据》,《价格理论与实践》1982年第4期;陈嘉亮:《关于农副产品价格补贴基本性质的探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⑤ 西奇尔·埃克斯坦、刘秉芸:《价格理论和利润的最大限度化》,《上海经济研究》1982年第11期;辛汝夷:《西方现代企业是怎样制定价格的》,《外贸教学与研究·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⑥ 马凯:《计划价格形成因素分析——兼论双渠计划价格的可观依据》,《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

⑦ 欧文、何旗:《美国商品价格是怎样制定的》,《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5期;薛仲章:《南斯拉夫的价格制度及其主要特点》,《价格理论与实践》1983年第3期;李滋仁:《有关泰国农产品价格的若干问题》,《南洋问题》1983年第2期;阎以誉:《保加利亚的价格改革》,《价格理论与实践》1983年第4期。

⑧ 楼继伟、周小川:《论我国价格体系改革方向及其有关的模型方法》,《经济研究》1984年第10期;周春:《论我国价格体系的改革》,《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4年第3期;陈大鹄:《商业价格体系改革的几个问题》,《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

⑨ 柳红:《历史之棱镜——莫干山会议三十周年再记》,《经济观察报》2014年9月8日,第45—47版。

## (二)关于价格讨论的文本内容概要

“莫干山会议”的7个课题组中,宏观组聚焦于价格改革,该议题讨论最为激烈。价格改革对推进中国经济改革十分重要,当时党政领导人对价格改革的方案却不是很有把握。<sup>①</sup>“莫干山会议”期间,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给中央常委的报告中指出价格改革是重中之重。<sup>②</sup>

从会后《经济日报》选刊的参会论文来看,价格议题会前关注的内容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一是分析价格体系不合理的原因。如田源、陈德尊认为价格体系不合理来自于旧社会遗留和计划经济体制两方面的因素。他们也批判了将价格体系不合理归咎于固定价格的观点,指出国家对价格进行管理并不等于固定价格,也不必然导致价格偏离价值。<sup>③</sup>二是强调价格改革的迫切性。代表认为,20世纪80年代不合理的价格体系阻碍了经济改革,价格体制不改,其他体制不可能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价格改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经济改革的进程。<sup>④</sup>三是探索价格改革的理论依据。田源、陈德尊主张依据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再生产理论,反对建立在“均衡价格”理论上的自由价格机制。<sup>⑤</sup>周小川等认为,中国的物价理论和通货膨胀理论需要突破。<sup>⑥</sup>四是价格改革的目标与实现路径。张维迎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在计划经济内导入市场机制,而市场机制的核心是价格。<sup>⑦</sup>田源、陈德尊认为价格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是以计划价格为主体,其他不适于纳入计划价格的允许其自由议价。<sup>⑧</sup>价格改革实现路径是“莫干山会议”中最具实践价值的部分,与会代表对这个问题各持“调”“放”“调改结合”等观点。五是价格改革的意义。张维迎认为,价格体制改革可以实现宏观控制、微观搞活,市场机制形成后,其他体制也会随之松动,经济结构也会逐渐合理,各地区的竞争力就会显示出来,农村和城市经济系统也会融合。<sup>⑨</sup>周小川等认为,合理化的价格可以促进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缓和供求关系并使企业库存下降。<sup>⑩</sup>

## (三)会议上形成的价格改革观点

关于价格改革路径,与会代表形成了三种意见,田源、陈德尊代表“调价”派,在与“调价”派辩论过程中张维迎阐述了“放价”派的主张,华生、何家成等人综合了“调价”派和“放价”派观点,提出了“改调结合”。

“莫干山会议”最初几日都是围绕“调价”思路进行争论。“调价”派认为,价格改革包括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两方面的内容,而持不同的价格理论,会有不同的目标模式。在计划价格包括的统一定价和浮动价格中,都以价值为基础。其中,浮动价格是主要形式。浮动价格由国家规定中准价和浮动幅度或规定上下限,具体由企业根据供求情况和规定的幅度限额自主决定。自由价格针对的是生产周期短、生产容易、投产和转产都不困难的产品。<sup>⑪</sup>

张维迎为代表的“放价”派提出,价格不能只是调整,关键是放开价格。“放价”派认为,调整价格

① 张军:《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一位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第XII页。

② 常修泽:《史料版1984年莫干山会议》,《学术研究》2012年第11期。

③ 田源、陈德尊:《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思路》,《经济日报》1984年9月29日,第3版。

④ 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价格改革无需增加财政负担》,《经济日报》1984年9月29日,第3版;张维迎:《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经济日报》1984年9月29日,第3版;田源、陈德尊:《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思路》,《经济日报》1984年9月29日,第3版。

⑤ 田源、陈德尊:《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思路》,《经济日报》1984年9月29日,第3版。

⑥ 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价格改革无需增加财政负担》,《经济日报》1984年9月29日,第3版;张维迎:《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经济日报》1984年9月29日,第3版;田源、陈德尊:《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思路》,《经济日报》1984年9月29日,第3版。

⑦ 张维迎:《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经济日报》1984年9月29日,第3版。

⑧ 田源、陈德尊:《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思路》,《经济日报》1984年9月29日,第3版。

⑨ 张维迎:《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经济日报》1984年9月29日,第3版。

⑩ 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价格改革无需增加财政负担》,《经济日报》1984年9月29日,第3版。

⑪ 田源、陈德尊:《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思路》,《经济日报》1984年9月29日,第3版。

并不是价格改革,价格改革是要解决价格制度的弊病。当时中国价格的问题在于价格制度切断了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使价格不成其为价格。在这种价格体制下,即使初始价格合理也会很快变为不合理。因此,价格调整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因此,需要改革价格体制,也就是有计划地放活价格管制,使得价格逐步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具体办法可以参照农副产品改革的办法,实行双轨制价格。<sup>①</sup>“调价”派对“放价”派的看法是,当时中国完全放开价格不现实,在市场不完备阶段,即使完全放开均衡价格也未必能够实现。<sup>②</sup>

“调改结合”派是在争论“以调为主”还是“以放为主”过程中产生的,代表人有华生、何家成、张少杰、高粱、蒋跃等。他们提出“先改后调,改中有调”的价格改革思路,主张利用工业品自销比例扩大、价格松动的趋势,进一步扩大工业品进入市场的比重,待主要物资市价统一、平稳、下跌后再分步调价。<sup>③</sup>也就是逐步缩小计划调配的生产资料,扩大市场自由调节部分,最后实现两个价格的统一。

“莫干山会议”价格改革议题中,主张“放”“调”“调改结合”三派相互促进,皆从不同方面对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的形成做出了贡献。从本质上来说,三种观点并非截然对立,而是都具有“放调结合”的内涵,只是在具体的方法上有所不同。“调价”派的田源、陈德尊认为,对价格体系的改革是除了可以开放的价格外,有计划地调整价格,并指出国家是有能力通过计划地调整解决中国价格体系的不合理问题。<sup>④</sup>周小川等人则试图通过技术方法减少价格改革震动,将原来价格逐步逼近市场均衡价格。<sup>⑤</sup>

三派之中,“调价”派代表了此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观点,没有“调价”便没有“放价”。张维迎把“放价”的思路引入到了价格改革中,“放价”派所秉持的观点最有理论冲击力。“调价”派和“放价”派只是侧重点不同,并非截然对立。没有“调价”“放价”的观点在前,更不会产生“调改结合”派的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调改结合”主张提出之后,受到了众多与会者的认可。

### 三、“莫干山会议”后的价格改革及价格改革问题的理论反思

#### (一)“莫干山会议”后的价格改革

“莫干山会议”后形成了相关会议报告,这些会议报告为中国经济改革决策提供了方略。<sup>⑥</sup>相较而言,在“莫干山会议”讨论的各个议题中,价格改革议题产生了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徐景安根据莫干山会议上价格改革议题的讨论撰写了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报告认为,由于国家计划供应和统一分配的能源、原材料比重很大,所以能源、原材料的调价不易解决。若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会冲击整个国民经济。在此情况下,如果逐步缩小计划供应物资范围,把统一分配的煤、钢材比重缩小到30%左右,则相对容易调整这部分物资价格。缩小计划供应物资的方法是:选择供求平衡或供过于求的一般机械、轻工、纺织产品,改为指导性计划或市场调节,取消指令性计划,放开其价格,实行浮动价或议价,同时取消供应平衡的煤、钢材。一个个行业逐步放开后,统一分配的煤、钢材比重缩小,然后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就不会对国民经济产生很大冲击。在缩小统一分配物资比重的同时,要建立、扩大、疏通物资市场。报告还指出,“先放后调,以放促调”的办法可以把复

① 张维迎:《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经济日报》1984年9月29日,第3版。

② 徐景安:《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5年第52期。

③ 徐景安:《“价格双轨制由来”的历史真相》,《香港商报》2012年1月19日,第A15版。

④ 田源、陈德尊:《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思路》,《经济日报》1984年9月29日,第3版。

⑤ 楼继伟、周小川:《论我国价格体系改革方向及其有关的模型方法》,《经济研究》1984年第10期;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价格改革无需增加财政负担》,《经济日报》1984年9月29日,第3版。

⑥ 会议报告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应从国营小企业和集体企业起步》《沿海十四个城市对外开放的若干问题》《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的几个问题》《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

杂、难以决策的价格改革大系统分解为一个个行业、一类类产品的小系统,改起来容易预测、决断和施行。同时,利用指令性计划外的浮动价、议价创造的市场机制,促进计划价格的改革。这不仅调整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又改革了僵化的价格管理体制。此外,把计划、物资、价格统一配置改革,缩小了指令性计划,又搞活了物资购销,还改造了价格体系,为企业放活、简政放权、政企分开创造了条件。这些问题的解决和突破,可以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打开新局面。<sup>①</sup>徐景安撰写的报告,使“莫干山会议”上形成的“调改结合”价格改革观点有了较高的操作性。<sup>②</sup>1984年9月张劲夫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同年10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sup>③</sup>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当时中国的价格体系不能反映商品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而合理的价格是保证国民经济活而不乱的重要条件,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由此,《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价格改革的的原则是:按照等价交换的要求和供求关系的变化,调整不合理的比价,该降价的降价,该升价的升价;提高部分矿产品和原材料价格时,加工企业须降低消耗,以在企业内部抵消由于矿产品和原材料价格上涨造成的成本增高,少部分工业消费品潜在的价格上涨由国家免税解决;解决农副产品购销价格倒挂和调整消费品价格时,确保城乡居民实际收入不因价格的调整而降低。与此同时,完善税收制度、改革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通过综合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调节经济运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发布反映了中国政府逐步解除对计划价格的管制,允许由市场确定价格。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发布,除个别品种外,取消自1953年开始实施的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分别实行合同订购和市场收购。这被认为在“莫干山会议”中形成的价格双轨制改革方案被采纳了。从1985年开始,中国形成了计划内政府定价、计划外市场定价的双轨制。到1986年底,国家计划委员会下达的工业指令性计划产品从120种减少到60种,国家统配物资从256种减少到26种。实行浮动价和市场价的比重,农副产品占65%,工业消费品占55%,生产资料占40%。<sup>④</sup>

由于双轨制的实施偏离了最初的设计,加之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价格调放不畅,制约了双轨制的实施绩效。1986年底,双轨制的实行滋生了部分人员利用计划内外价格差距来赚取钱财的腐败现象。中国对价格改革产生了动摇,并转而投向了地方放权和政企分开的改革。<sup>⑤</sup>

虽然价格双轨制改革一度受到了部分学者的质疑,<sup>⑥</sup>但20世纪80年代末期后,价格双轨制改革的理念在中国政府的对内改革中一直延续。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执行计划价格的商品比重越来越小,执行市场价格的商品越来越大。国有企业正式按照市场价格运营,消费品逐渐采用了市场价格体系。<sup>⑦</sup>随着调控价格与市场价格趋于一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双轨制价格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

① 徐景安:《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5年第52期。

② 张维迎在“莫干山会议”前所提交的会议论文中提到了“双轨制价格”,他认为价格体系改革的具体办法可以参照农副产品价格改革的办法,实行双轨制价格,旧产品用旧办法管理,新价格用新办法管理,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价格制度。张维迎指出,双轨制的实行办法是,对原牌价与市场议价相差过大的产品可以实行分阶段放,或先调后放。徐景安执笔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中只提到了“放调结合”,并没有使用“双轨制”,但该报告囊括了“双轨制”价格改革实践层面的内涵,即按照这种改革思路在改革过程中会形成一种物资两种价格的现象。除了徐景安撰写的价格改革专题报告之外,还有两个附件,分别是来自于田源的以调为主的价格改革观点和华生写的放调结合的价格改革建议。其中,华生的报告附件中,也使用了“双轨制”。

③ 张卓元等:《新中国经济学史纲》,第194页。

④ 徐景安:《“双轨制”改革的由来》,《财经》2008年第5期。

⑤ 张军:《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一位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第XIII、XIV—XVI页。

⑥ 郭树清、楼继伟、刘吉瑞、吴敬琏、李剑阁、周小川等认为,中国的改革需要整体设计才能有效,不能仅仅对价格进行局部改革。

⑦ [美]巴里·诺顿著,安佳译:《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2页。



表 1 价格改革变动表(1990/1992/1994/1996年)

	价格形式	1990	1992	1994	1996
社会商品零售	政府定价	29.8	5.9	7.2	6.3
	政府指导价	17.2	1.1	2.4	1.2
	市场调节价	53.0	93.0	90.4	92.5
农产品收购	政府定价	25.0	12.5	16.6	16.9
	政府指导价	23.4	5.7	4.1	4.1
	市场调节价	51.6	81.8	79.3	79.0
生产资料销售	政府定价	44.6	18.7	14.7	14.0
	政府指导价	19.0	7.5	5.3	4.9
	市场调节价	36.4	73.8	80.0	81.1

资料来源:《中国物价》1997年第12期,转引自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第168页。

## (二) 价格改革问题的理论反思

20世纪80年代,农村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城市改革如何进行摆在了中国政府面前。在社会经济需求的现实背景下,1978年后,经济学界对价格问题的讨论逐步突破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开始从多种角度探索中国价格改革之路。从源头上来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早先的价格调整方案暗含了价格双轨的做法,<sup>①</sup>而在“莫干山会议”之后,这些做法得到了理论和实践上的进一步明确。价格双轨制形成于“莫干山会议”的观点已经被广泛接受,然而中国经济学者在此前的理论探索中也一度提出过类似的主张,如1982年刘国光在阐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时曾提到,“随着买方市场的逐步形成,随着价格的合理化,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sup>②</sup>

“莫干山会议”不仅对后来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也是中青年经济学者崭露头角的时代契机,促进了中青年经济学者研究队伍的成长。“莫干山会议”后的1985—1987年,经济学界对价格的讨论十分活跃,这些研究不仅从理论上分析了价格的功能,<sup>③</sup>还结合中国国情探索价格改革道路,<sup>④</sup>并从经济体制改革角度分析了价格改革的意义。<sup>⑤</sup>价格闯关失败后,中国政府自1989年对经济实行全面“治理整顿”,经济学界对价格改革的讨论旋即减少。<sup>⑥</sup>

从关于价格问题论著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界分析社会经济问题的范式逐渐突破原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迹象。张维迎提交的“莫干山会议”论文比较明显地受到了经济学中均衡价格理论的影响。<sup>⑦</sup>在论证以自筹资金实现价格改革时,周小川等人用了供给与需求弹性理论进行了分析。<sup>⑧</sup>虽然上述理论目前已众所周知,但这些对价格改革问题的分析视角在当时具有革命性意义。

价格改革问题学理上的些微变化,背后体现了社会经济需求的需求。社会经济需求的迫切需求

① 时任国务院总理对徐景安执笔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批示指出,“广东的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及粮棉油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实质上都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

② 刘国光:《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人民日报》1982年9月6日,第5版。

③ 张维迎:《论价格功能》,《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胡昌暖:《论价格体系变动规律》,《经济研究》1985年第5期;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办公室:《理论价格的研究及其应用》,《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

④ 华生、何家成、蒋跃等:《论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道路》,《经济研究》1985年第2期;薛暮桥:《调整价格和改革价格管理体制》,《经济研究》1985年第1期;杨仲伟、李波:《价格形成与价格改革》,《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张卓元:《社会主义价格理论与价格管理体制》,《管理世界》1986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价格改革课题组:《价格进一步改革的问题与思路》,《经济研究》1987年第4期。

⑤ 张卓元、边勇壮:《价格改革仍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兼与厉以宁同志商榷》,《商业研究》1987年第2期。

⑥ 王海林:《关于建设和发展我国统一的生产资料市场问题——兼谈废除“双轨制”价格的紧迫性》,《中国物资》1989年第S1期;张军:《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一位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第XIV—XVI页。

⑦ 张维迎:《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经济日报》1984年9月29日,第3版。

⑧ 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价格改革无需增加财政负担》,《经济日报》1984年9月29日,第3版。

推动了“莫干山会议”的召开,并在会议的讨论中产生了后来价格双轨制改革的初步方案。按照莫干山会议上价格改革的理论设计,一种物资实行双轨价格,市场价格高于计划价,计划分配比例逐步缩小,市场份额逐步扩大,这样不仅能避免改革带来的社会大震荡,同样可以减少改革阻力。双轨制改革思路的本质是在旧体制的基础上引进新体制,并逐渐使新体制取代旧体制,因此这是渐进改革模式。<sup>①</sup> 价格双轨制改革突破了计划经济制度,为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初步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国的价格改革采取了利用双轨制、走出双轨制的方式,其路径是沿着消费品价格改革、生产资料价格改革、要素价格改革的次序进行的。迄今为止,中国的价格改革已经走过了消费品价格改革、生产资料价格改革两个阶段。<sup>②</sup> 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生产要素价格仍未完全放开,农产品和矿产品价格仍然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这造成了地区之间发展失衡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sup>③</sup> 有观点认为,中国的能源、原材料、交通和粮食等产品的价格迟迟未能放开与国有企业职能没有发生根本转变有一定的关联。<sup>④</sup>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完40年的征程,如今现代化建设事业处于关键时期,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阶段,改革的任务较前期更加复杂且艰巨,如何继续深化价格改革,从而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是一项重大课题。

## From Planned Economy to a Chinese Style Market Economy:

### The Formation of the Price Reform Path of China in the 1980s

—Based on the Young and Middle-aged Economists Symposium in 1984

*Miao Degang*

**Abstract:** After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 work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transferred to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made a preliminary adjustment to the single price system formed under the original planned economic system. By the beginning of 1980s, the irrational price system still restric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Under the background, the young and middle-aged economists symposium discussed the majo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reform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 at that time, this symposium provided many important reform paths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 in the 1980s. Among them, the reform path of dual-pricing system had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lthough some negative social problems had been brought,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ual-pricing system, the dual-pricing system had promo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Key Words:** Moganshan Mountain Conference; Price Reform; Dual-pricing System

(责任编辑:黄英伟)

① 徐景安:《“双轨制”改革的由来》,《财经》2008年第5期。

②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第167—168页。

③ 赵人伟访谈,2017年11月29日。

④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第242页。